全球粮食价格波动的结构性成因分析

苏瑞娜

（南京大学 政府管理学院，江苏 南京 210046）

摘　要：市场供求关系影响全球粮食价格，但塑造市场结构的主导权力限制着供求关系并决定了全球粮食市场价格的长期趋势，把握住塑造粮食市场结构主导权力的特征及其目的，就能判断出全球粮食价格趋势的基本走向。全球粮食市场中最有竞争力的主体可以凭借对国内市场结构的塑造并通过国家权力将这种市场结构推广到世界市场中以满足自身的利益需求。目前全球粮食市场体系中的主导权力是美国的私营资本。私营资本对垄断利润的追求主导着目前全球粮食市场的基本走向，因而全球粮食市场价格呈现出一种持续的高位震荡局面。

关键词：粮食价格；粮食制度；市场供求；私营资本

中图分类号：F316.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202(2014)03－0085－12

一、问题的提出

自 2002 年以来，全球粮食价格便逐渐走高，2005 年之后国际粮价更是呈现出全面上涨态势。仅 2005 年到 2008 年这三年间，全球市场上的大米、小麦、玉米价格就分别上涨了 25%、70% 和 80%[1]。整体来看，2002 年初到 2008 年 3 月，世界市场上的小麦价格上涨了 200%，同期大米价格更是上涨了 430%[2]。虽然 2008 年之后，国际粮食价格有了一段时间的小幅回落，但 2010 年开始，全球粮价又向上攀升。与 2002 年之前的价格走势相比，2008 年以来的全球粮食价格呈现出一种高位震荡的局面（见图 1）。如何理解近年来全球粮食价格的全面上涨以及剧烈波动，其背后的真实原因是什么？本文的整体研究便围绕着这一问题而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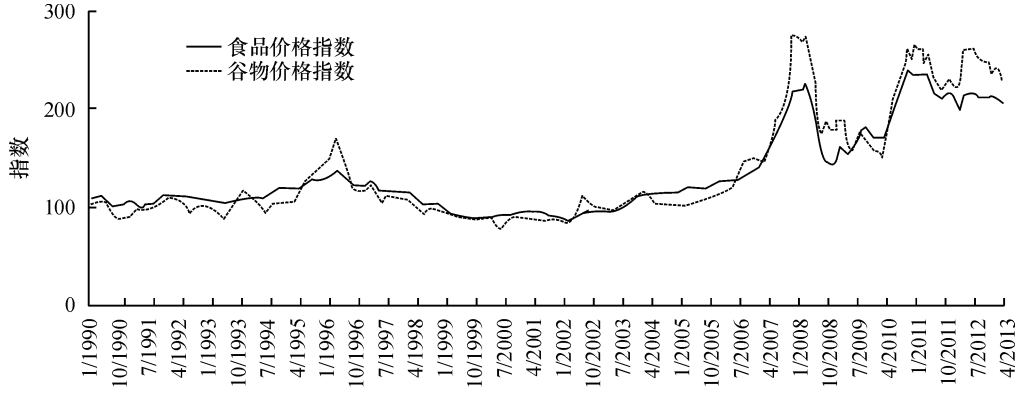


图 1　1990 年到 2013 年粮农组织价格指数示意图①

收稿日期：2014－03－23

基金项目：江苏省 2013 年度科研创新计划（CXZZ13_0012）；江苏省重大项目（2013ZDAXM008）

作者简介：苏瑞娜（1985—），女，陕西西安人，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政治经济学、全球粮食安全。E-mail：suruina1103@163.com

① 数据来源：http://www.fao.org/worldfoodsituation/%20foodpricesindex/en/

二、全球粮食市场价格波动的两种研究路径

作为一种基础性商品,粮食价格的全面暴涨极易导致恶性通货膨胀,并引发普通民众生活成本的大幅飙升。粮价暴涨不但会动摇社会稳定、降低经济发展速度,甚至还会造成人道主义灾难与全球范围内的动荡不安。粮食关乎个人生存、国家发展以及国际社会正义的维系,因而对粮食问题的研究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长久以来,粮食问题就一直备受理论家们的关注。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在研究贸易问题时就曾详细探讨过小麦市场价格的成因[3,4]。马尔萨斯曾关注粮食供给问题,他认为有限的土地无法为无节制人口增长提供必备的粮食,长远看粮食供应是相对稀缺的[5]。刘易斯则指出马尔萨斯之所以会得出粮食相对稀缺的判断是因为他没考虑到农业部门中的技术进步,但刘易斯强调工业化才是经济发展的重心,农业的主要作用是为工业提供廉价原料[6]。在刘易斯式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式下,会出现一个维持低粮价的农业部门以满足工业部门降低成本、增加利润的需求。阿玛蒂亚·森在其关于饥荒的研究中也指出粮食的相对稀缺这一出发点有待商榷。森强调全球粮食供给是充裕的,但森也注意到供给充裕并不代表对粮食的获取也是充裕的,因为饥荒还取决于食物的分配问题,而一个社会中食物的分配受到交换权利关系的影响[7]。

森为研究粮食价格问题提供了一个新思路,即要关注市场交换中的权利关系问题,这就使得在研究市场价格时不仅要关注供求问题还要注意到权力对市场供求的控制性影响。实际上,现有对全球粮食价格波动的分析就可以按照是否关注权力的控制问题而分为两类。第一类研究认为,全球粮食价格波动的主要原因是由市场供求关系变化引起的,这类研究将对供求的理解局限在市场内部,将市场视为一个不受干预的独立系统。第二类研究虽然也关注供求关系,但却扩张了对供求关系的理解,这类研究认为单纯研究独立市场下的供求关系只是在市场的表象上徘徊,忽略了影响市场的深层原因,他们认为还需要关注什么力量控制着市场,使得供求关系呈现出特定的外在表现形式,这种控制性力量就是潜藏在市场背后的权力结构。在他们看来市场本身并非是独立运转的,而是嵌套在大的权力结构中受其影响。

大多数经济学领域的研究都遵循第一类研究路径,在分析全球粮食市场价格时,他们将关注重点集中在全球粮食的市场供求是否平衡上。关注气候变化对全球粮价影响的研究认为,气候可以通过影响粮食产量来限制全球市场的粮食供给,进而影响全球粮食价格[8]。有关能源燃料与全球粮价关系的研究则指出,石油价格会通过影响粮食生产、运输成本来影响粮食价格[9]。相关生物燃料的研究则认为生物燃料的发展会消耗大量粮食,造成粮食稀缺、引发粮价上涨[10]。有的研究关注投机行为对全球粮价波动的影响,认为期货市场上的投机行为可以通过改变了全球粮食库存的分配安排,来影响世界市场的价格[11]。在另一些研究者看来,美元的持续贬值是近年间粮价高涨的一个主要原因[12]。除此之外,还有的研究关注宏观经济因素,认为经济增长以及通胀预期推动了近年来粮食需求上扬,造成了大宗商品价格上涨[13]。近期的一些研究则指出经济衰退和金融危机对全球粮食价格产生了重要影响,并认为2008年的金融危机恶化了全球贸易条件,削减了农产品的进口量,促进了粮食价格的上升[14]。

虽然这些研究在分析重心上完全不同,但它们的分析思路却存在着一定共性。这类研究都遵循微观量化研究方法,将研究视角集中在市场内部,在分析粮价波动时摒弃了权力因素的控制作用,这些研究者本质上还是强调自由市场的组织原则。实际上,那些批判自由市场组织原则、关注不平等交换的学者就指出市场从来就不是一个独立运转的系统,它还受到更大时空范围内社会系统运转机制的影响,尤其是大的社会系统中存在的权力结构的控制。比如波兰尼就认为:“自我调

节的市场的理念,是彻头彻尾的乌托邦。除非消灭社会中的人和自然物质,否则这样一种制度就不能存在于任何时期;它会摧毁人类并将其环境变成一片荒野。”[15]将市场理解成孤立系统进而关注供求关系影响下的商品价格忽略了超越市场的因素对供求关系的控制。

第二类研究则弥补了对权力的忽视这一缺陷。权力关系本质上是一种非对称的控制关系,因而权力关系能够塑造一种非对称的市场结构,改变原来自由市场中供求关系的运作机理。较早开始关注权力影响市场的研究主要将研究重点集中在国家权力与国际市场的互动上。德里克·海蒂(Derek Heady)在研究近期全球粮食价格波动时,就通过历时性描述方法来说明国家政策的反馈效应对全球粮食价格的影响[16]。海蒂关注政府政策与市场的互动,更深层次地讨论了国家权力对粮食价格波动的影响,并尝试设计一种能够测算国家权力效用的计量模型[17]。但该模型中存在的最大难题是如何确保政策的可预测性。威尔·马丁(Will Martin)和科姆·安德森(Kym Anderson)也曾将国家权力加入到价格波动模型分析中[18],但他们的研究依然没有能够解决政策的可预测性这一难题。

针对国家权力效用的研究,虽然对以往关注市场内供求关系的研究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良,并注意到权力对市场供求的影响,但这类研究是将权力的作用视为一个附着在市场供求关系之上的因素,并没有深入分析权力因素对整体市场结构的塑造以及控制作用。粮食制度理论则修正了这一思路,开始深入研究权力的控制作用对全球粮食市场结构的影响以及对粮食价格趋势的塑造。

粮食制度理论着重讨论权力的控制性问题,将市场放置进更大的背景中加以考察以探寻价格波动的深层次结构原因。在粮食制度理论看来,价格波动仅仅是市场结构的一种外在表现形式,而塑造市场结构的则是蕴含于市场之中并控制市场运转的权力,只有清楚地理解相关权力主体的特征,才能更深刻地理解市场结构本身,也才能把握住价格波动的内在规律。如此一来,一段时期内的价格波动便不仅仅是这一时期内供求关系变化的简单结果,还受制于这一特定时期内权力主体所塑造的市场结构的约束。

粮食制度理论所探寻权力所塑造的市场结构恰是布罗代尔所谓的“潜流”,在布罗代尔看来,若要研究社会与历史的具体事件,不应只关注事件的表象本身,而应对影响事件更深层的原因进行一种长时段(la longue duree)的考察,以便揭示出主导事件走向的“潜流”,也即一定的历史性深层结构[19]。“潜流”从根本上支配着表象的事件,在它的支配下,错综复杂的事件便具有了本质上的统一性。因而,不管是关注市场供求关系的微观研究也好,还是将国家政策因素加入供求关系的分析也罢,他们均忽视了更长时段、更深层次因素,也就是权力因素塑造的特定市场结构对供求的控制与约束。

粮食制度理论之前的其他研究关注规律的普遍性,将分析限制在几个有限的变量上来寻求普遍性规律,这些研究的前提假设是变量之外的因素都是作为背景存在的,变量所赖以存在的整体秩序也是保持不变的。但粮食制度理论则选取了一种批判式的分析路径,它更关注现存秩序的本质,通过一个更宏大的视角来理解体系结构变化的根源,因而它更关心市场背后的权力因素对市场结构的塑造以及对市场本身的控制作用。换句话说,以往遵循自由市场原则的分析只关注市场的水平维度,将市场锁定在平等主体之间的交换以及交换之下的供求问题上。但粮食制度理论则给这种水平维度添加了垂直维度,通过加入权力因素的分析,粮食制度理论认为供求问题就不单单是水平向的平等交换,更具有一种结构上的由权力造成的等级性与不平等性。在权力的影响下,主体之间的权力差异会造成一种非对称的交换,进而形成一种非对称的市场结构。

按照粮食制度理论的思路,在研究近年来粮食价格持续上涨与剧烈波动时,就不能仅仅将分

析局限在关注粮价波动的短期成因上,而需要将这一时期的粮价波动放置到粮食市场体系结构的历史发展总趋势中进行理解。之所以要关注市场体系结构的历史发展总趋势,是因为全球粮食市场上的供求关系受全球粮食生产与消费体系的影响,而全球粮食生产与消费体系的形成、发展与变革则在本质上受国际分工体系的影响,究其本质而言,塑造国际分工体系的是世界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权力。正是由于在市场参与主体之间分配着的不同权力资源,使得不同的主体对于市场能够施加不同的影响,因而最具控制性权力主体则能够实现对市场的主导。主导市场的权力不仅能够导致市场主体之间在交换上的不平等,还能够塑造一种有利于固化不平等交换的市场结构。

进而,弗里德曼(Harriet Friedmann)认为可以通过对现有粮食市场体系的规则变化进行分析来追踪粮食体系中权力结构的变迁,因为"这种规则结构由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权力关系决定,粮食市场规则的变化反映出国家内以及国家之间权力的不断变化"[20]。麦克米歇尔(Philip McMichael)在他的另一篇文章中指出,研究粮食价格波动需要关注粮食贸易关系在资本积累中的作用[21]。如果从资本积累的角度上来看粮食市场的体系结构,那么粮食市场体系中的权力配置模式受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权力配置模式的限制,并随世界体系中主导权力所追求利益的变化而发生转变。

主导权力控制全球粮食市场的运作机理遵循考克斯所描绘的历史结构三个层次上的互动,考克斯认为在生产组织的变化中会出现新的社会力量,这种新的社会力量能够重塑国家结构,进而通过将国家结构普遍化来改变世界秩序[22]。世界经济中最有竞争力的生产组织可以凭借对国家结构的塑造来追求改变世界秩序,让全球市场服务于自身的利益追求。也就是说,全球市场中的主导权力往往是全球经济中生产能力最强的社会力量。

正是发源于生产的主导权力形成了粮食市场的核心结构,决定了粮食市场的供求本质,影响着粮食市场周期的趋向,而那些影响供求的市场性因素则在权力塑造的特定趋势下对市场的波动产生短期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讲,价格作为一个敏感的市场信号,长期来看,它体现的是主导权力控制下的市场本质。粮食市场结构本身的特点构成了全球粮食价格波动的长期趋势与底色,市场内部的供求因素会加剧这个趋势下的价格波动,但不会脱离整体的趋势。把握住了塑造粮食市场结构主导权力的特征及其追求的目的,就能够大致判断并预测出全球粮食市场价格基本走向。

三、全球粮食市场结构的历史演变

从历史经验上看,跨区域的粮食市场早在古希腊古罗马时代就已经出现①,但全球性粮食市场则晚至工业革命时期才逐渐形成,全球粮食市场的发展服务于世界体系的资本积累进程,因而它是被世界体系中生产能力最强、最具控制力的权力主体所塑造而成并随世界体系中权力主体的变迁而发生变化。对于全球粮食市场中存在着的权力主体及其对市场的控制作用,可以通过全球粮食贸易的方向性来加以锁定。全球粮食市场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进化过程,它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但在历史中进化着的全球粮食市场一直有一个稳定的特质,即市场中粮食的贸易流动具有持久的方向性。如果全球粮食市场是一个匀质、散漫且没有权力干预的市场,那么粮食贸易的流向就不可能有持久的方向性,因为竞争会随时打破市场内部贸易流动的方向。这种持

① 跨区小麦市场出现的非常早。在古希腊罗马时代,跨区的小麦贸易往来就形成了规模巨大的区域性小麦市场。这种贸易是一种宗主国—殖民地的贸易模式,即在宗主国的控制下,殖民地出口小麦供应宗主国城市居民的日常消费。

久的方向性就为分析权力的作用提供了明确的标识。

自全球粮食市场体系形成至今,其贸易流向经历了两次大的更替。根据全球粮食市场贸易控制中心的变化,可以将全球粮食市场分为两个历史阶段:英国主导下的全球粮食市场体系和美国主导下的全球粮食市场体系。在 19 世纪末期形成的英国主导下的全球粮食市场主要服务于英国及其欧洲盟国工业资产阶级获取廉价粮食的利益诉求,在工业资产阶级的控制下,粮食从世界各地流向以英国为中心的欧洲工业国,并维持了一个低价的自由贸易粮食市场[23]。随着英国的没落,这个体系在两战之中遭到破坏。二战后,控制美国农业生产的私营资本借助美国霸权地位重新主导设立了一个服务于私营资本为追求粮食出口、获取垄断利润的新型全球粮食市场体系,在这个体系下美国所有的政策努力只有一个目标,即将国内生产输送到国际市场并实现对国际市场的垄断。私营资本借助美国国家权力先是通过低价倾销打开国际市场壁垒、挤压他国生产;在改造了市场结构使得其他国家开放市场、依赖美国粮食之后,美国的私营资本便进一步追求控制世界市场粮食供应,获取垄断利润的目的。因此在二战后,全球粮食市场价格的长期趋势是一个先抑后扬的发展过程[24]。

(一)英国主导下的全球粮食市场结构

在 5 世纪到 9 世纪的欧洲,农产品价格制度逐步确立起来,当时欧洲区域内的粮食贸易已初具规模。这一阶段在欧洲内部形成了特殊的专业化分工模式,即不发达地区提供粮食,而发达地区则在此基础上集中发展工业[25]。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特定的区域专业化分工模式逐渐固定下来,但随着欧洲城镇工业的发展以及城市的进一步扩张,欧洲内部的粮食生产便难以维持中心区日益增长的需求。近代之后,这个区域性粮食市场的边缘便开始向外扩张。在英国掌握世界体系霸权之后,一个以英国工业资产阶级需求为控制中心的全球粮食市场体系逐步成型,因而在英国主导全球粮食市场时,全球粮食价格呈现出低价趋势[26]。

1. 国内市场结构的变革:英国工业资产阶级的主导作用

中世纪以来,英国一直是个粮食出口国,它很少进口谷物等粮食,国内少量的粮食进口也大多是用来从事转口贸易之用[27]。但随着英国国内工业的发展,国内的粮食生产开始无法满足国内需求。18 世纪中后期,英国国内就常常出现粮荒,到了 19 世纪英国本土的粮食变得异常稀缺[28]。

从中世纪延续的传统来看,英国国内的主流政策是采取各种手段来保护国内粮食生产以促进出口,保护政策维护了英国国内农业生产者的利益,如此一来英国国内的谷物价格往往较高,但这却限制了英国国内工业资产阶级的发展。17 世纪 50 年代开始,随着英国国内工业资产阶级的壮大,对于谷物市场放松管制和自由贸易的呼声就高涨起来[29]。18 世纪末到 19 世纪初,英国完成了工业化所需的集中城市化建设,此时国内粮食危机频频发生。工业化发展对廉价粮食的需求使得英国开始追求撤销国内生产保护,并通过粮食进口的方式来增加国内粮食供应,降低国内粮食价格。

1846 年 3 月 27 日,英国下议院以 327 票对 229 票赞成废除《谷物法》,取消粮食、大麦、燕麦等主要谷物的进口关税[30]。《谷物法》的废除被视为英国从保护主义转向自由贸易的一个转折点。废除《谷物法》的最主要目的是要降低英国国内工人的生活成本以塑造工业竞争优势。《谷物法》废除之后,英国走上了依赖进口粮食的道路,并借助自身的霸权塑造了一个以国内工业资产阶级的需求为中心的广阔粮食市场。这个全球粮食市场确保了英国工业化发展所需粮食的充裕供应,使得英国国内得以维持一种稳定、低廉的粮食价格[31]。

2. 国内市场结构在全球市场的延续:英国霸权的推动作用

英国工业资产阶级在国内取得成功之后,并没有就此止步,而是进一步利用英国在世界体系

中的霸权地位,在欧洲盟国的支持下塑造了一个服务于英国及其盟国国内工业资产阶级利益的全球粮食市场结构。当然,英国在世界体系中的霸权地位是其国内工业资产阶级得以主导全球粮食市场体系结构的根本原因。

英国工业资产阶级又是如何借助英国的霸权地位来控制全球粮食市场的呢?一个主要方式便是在全球市场上设立一套能够巩固工业资产阶级利益诉求的市场制度。在比尔·温得尔(Bill Winders)看来,1860年英法签定的柯步登—富安条约就是英国主导下全球粮食市场制度建立的开端[32]。之后,英国借助一系列双边条约和多边条约将自由贸易制度在全球粮食市场中推广开来。在英国开放了国内粮食市场之后,欧洲核心国也转而支持粮食自由贸易,进而这种制度在全球层面上得以迅速扩展,并确立了英国在全球粮食市场上的主导地位[33]。

19世纪后期,一个以英国及欧洲工业发展需求为控制中心的全球粮食市场开始成熟,这一时期大量廉价充裕的粮食从世界各地涌入英国和西欧。19世纪60年代,英国的粮食主要来自波罗的海的丹麦、波兰,黑海地区的俄罗斯,70年代到80年代英国的属地美洲和印度的粮食占据了越来越多的市场份额,19世纪后半期,世界粮食的生产开始被纳入进这个单一的以西欧需求为主导的市场中[34]。自由贸易的粮食市场制度使得英国和欧洲得以进口廉价粮食以降低工业生产成本,之后再通过向殖民国家出口工业制成品获取高额利润[35]。这一时期,整个全球粮食价格呈现出一种低价趋势。

但英国塑造的自由贸易市场体系存在着一个重要缺陷。这个市场体系是依靠英国的霸权优势来维持的,加之英国主导签订的各种双边和多边条约体系并未在全球层面形成一种统一的制度根基与认同环境,这就造成了该市场体系的不稳定。所以当英国丧失了霸权优势后,自由贸易的全球粮食市场体系就失去了稳定性。

英国在初期成功地通过一系列双边或多边协定获得了欧洲中心国对自由贸易粮食市场体系的支持并将其扩展到全球,但欧洲中心国的支持很快就随着廉价粮食在欧洲大陆的泛滥而变得摇摇欲坠,法德等国家为了保护国内的粮食生产而逐步采取保护措施[36]。之后,英国失去了对世界体系的控制权,全球粮食市场也便陷入了混乱之中。两次世界大战打乱了英国主导的全球粮食市场体系,全球粮食市场价格呈现出混乱状态,直到美国在二战后掌握了世界体系的控制权后全球粮食市场才重新有了一套新的秩序基础。

(二)美国主导下的全球粮食市场体系

一战的爆发与战时管制政策在战后的延续,摧毁了英国主导的自由贸易粮食市场体系。因而在两战间,全球粮食市场上的价格便呈现出一种动荡不安的局面[37]。由于此时在全球层面缺乏一个主导权力来协调并解决生产与消费问题,因而各国只能依靠国家权力通过补贴和政策支持等干预手段来解决全球粮食市场动荡对国内生产者的伤害。这种以邻为壑的保护主义加剧了全球粮食市场的混乱。在二战之后,随着美国成为世界体系的霸权国,美国便主导塑造了一个以生产供应为控制中心的全球粮食市场体系。在美国主导全球粮食市场时期,全球粮食价格先是由于美国对外倾销剩余呈现出低价趋势,而后在美国控制了全球粮食供应之后,全球粮食价格便开始逐步走高[38]。

1. 国内市场结构的变革:美国私营资本的主导作用

与英国不同的是,塑造美国国内市场结构的并不是工业部门和农业部门之间的竞争,而是控制美国农业生产的私营资本一直以来的利益诉求。在殖民时代,美国国内的农业生产主要是以家庭农场为主[39]。18世纪初,美国的粮食种植开始向中部扩张[40],但随着生产的扩张,美国中部殖民地的粮食生产便快速发展起来,这时的粮食生产开始转向专为出口的商业化生产,私营资本便

逐步介入到粮食生产中。19 世纪 70 年代,在明尼苏达等地开始兴起了一种大农场组织形式,这种农场常常占地几万亩,大规模使用机器、雇佣好几百名劳力[41]。除了采用雇佣劳动力替代家庭生产进行耕作之外,越来越多的私营资本加入了农场经营之中。农场主往往会通过举债的方式借助私营资本来实现扩张,因而随着扩张的加速原来的家庭农场主们也越来越陷入到私营资本的控制之中[42]。

随着农场的不断发展,私营资本强化了对农场的控制。更大的、更具生产效率的大农场挤掉了小的、无效的家庭农场并占据主导地位。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美国的农场生产更是从商业化生产转向了资本化生产。而推动这一变革进程的,正是控制着大农场的私营资本。私营资本通过农业技术、市场渠道和金融等手段进一步控制了农场生产,为其获取垄断高额利润而服务,农场也在资本的引导之下为了追求利润而激发了最大限度的生产潜力。

二战后,美国国内的农业政策以 70 年代为界可以划分为两个完全不同的阶段。70 年代之前,美国农业部门的政策一直维持着国家干预的保护主义道路,即对内保护、对外倾销;而 70 年代之后,美国农业部门则转而推行自由贸易。从根本上讲,这还是私营资本影响下的结果。

1870 年到 1900 年间,美国的农业部门完成了商业化生产改造,自此私营资本就成为美国农业部门中一股强大的力量。在私营资本的协助下,美国的粮食生产以服务世界市场并控制市场供应为主要目的。然而,20 世纪 30 年代的大萧条使得海外市场纷纷关闭,美国国内积压了大量的生产剩余,引发了美国国内农场危机,沉重地打击了私营资本力量。这时私营资本转而寻求国家权力的庇护。30 年代美国政府用财政手段吸收国家剩余,并在 40 年代借助美国的霸权优势将这些剩余以对外粮食援助的方式转嫁到海外市场之上,协助私营资本打开海外市场,因而这一时期美国的农业政策呈现出浓重的国家干预色彩。

70 年代之后,在国家保护下壮大起来的私营资本不仅完全控制了美国国内生产还借助援助渠道逐渐掌握了海外市场的供应渠道,而这时自由竞争的市场环境更能发挥私营资本的优势,因而私营资本便将美国的农业政策推向自由化一边。二战后,美国整体的农业政策,便是逐步从保护主义滑向市场自由化的过程,这其实还是美国农业部门中私营资本势力影响的结果。

出口竞争的加剧促进了国内粮食生产的变革,借助粮食援助成长、并在对外贸易竞争中壮大起来的私营资本继续推动美国国内粮食在生产、存储、运输、处理上的整合。80 年代中期,以农业企业为代表的私营资本通过兼并收购牢牢地控制住了国内粮食的整个产业链。国内的产业化重组反过来强化了农业企业在海外市场的竞争力。90 年代美国农业企业成长为跨国农业综合企业,它们开始积极发展生物基因技术、降低运营成本、强化风险控制,并通过推动粮食市场金融化来谋求对全球粮食市场的整体控制。对全球市场的整体控制是跨国农业综合企业的最终目标,而一个自由开放的竞争性环境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这些跨国农业综合企业的竞争优势,因而跨国农业综合企业加速推动美国主导的全球粮食自由贸易市场体系建设,以满足自身对全球粮食市场的整体控制的利益诉求。

2. 国内市场结构在全球市场的延续:美国霸权的推动作用

美国的私营资本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的利益诉求不仅主导了美国国内市场结构的变化,还借助美国霸权地位在全球塑造了一个服务于私营资本利益诉求的市场结构。二战后,美国主导的全球粮食市场同样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70 年代之前,以解决美国国内生产剩余为核心的全球粮食援助体系;第二个阶段,70 年代至今,以追求垄断全球粮食市场供应的自由贸易粮食市场体系。

自 20 世纪 40 年代中期开始,美国着手在全球推广多边粮食援助制度体系,这个体系的核心目

标是将美国国内的生产剩余倾销至海外。美国主导的这个全球粮食援助体系是美国采取国家干预措施应对30年代国际粮食市场萧条的产物。早年美国为解决30年代全球粮食市场大萧条造成国内生产剩余问题时,主要是通过政府购买的手段人为地吸收掉国内的过量生产剩余以在国内维持一个稳定的价格来确保私营资本利益。但美国这种国家干预手段只是暂时将生产剩余囤积在政府手中不让其流入市场,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剩余问题。这不仅给美国政府带来沉重的财政负担,还变相地鼓励美国国内的生产过剩。为了降低财政负担并有效解决美国国内生产剩余,美国便谋求通过自己的霸权优势将国内剩余转嫁到海外市场上。

然而由于二战后国际环境的限制,美国很难通过正常的贸易渠道将国内的生产剩余转移出去。二战中各国奉行的粮食管制政策在战后的延续以及冷战中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对峙,都促使世界各国继续奉行国家干预政策,通过国家保护来扶持国内粮食生产,限制粮食进口对国内生产的干扰。美国一方面为了解决国内剩余,一方面为了争取盟友、打开海外市场,便采取了海外粮食援助这种非贸易手段建立了一个全球粮食援助制度体系,通过援助的方式将国内的大量剩余低价输送到海外各国的市场上。进而,美国又将自己的双边援助制度体系移植到国际制度中,通过粮农组织等国际机构设立一套多边粮食援助制度体系进一步强化美国对外倾销剩余粮食的合法性。

对外粮食援助制度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美国国内的过量粮食剩余,之后粮食援助制度的重要性开始下降。并且随着粮食援助制度的发展,该制度也变得越来越难以维继。逐渐消耗了美国国内的过量剩余,粮食援助政策不仅给美国带来了很大的财政负担,还使得欧洲农业得以重新振作。欧洲农业的恢复以及对美国产生的竞争压力,都促使美国逐步放弃粮食援助这种低效率的出口手段,并尝试拆除欧洲保护政策以便能够在自由竞争中释放自己更具优势的生产能力。凭借粮食援助建立的海外渠道,美国促使很多第三世界国家逐步放弃国内粮食自给自足的生产模式,转而对美国的粮食产生依赖,这使得美国控制第三世界国家的粮食供应成为可能。但随着20世纪60年代农业革命的出现,原来依赖美国粮食的第三世界也开始降低对美国粮食的进口依存度,使得美国仅凭粮食援助的倾销作用已经很难控制第三世界国家的市场供应。

二战后,美国借助多边粮食援助制度建立了一个国家干预的多边粮食市场体系以解决国内生产剩余、维持本国粮食出口的稳定。然而,由于该制度无法完全发挥私营资本的竞争优势,因而当美国解决了国内剩余问题之后,国内私营资本便开始想要通过自由竞争机制来谋求对国际市场的控制,进而推动美国在全球建立一个自由贸易的粮食市场体系。

美国在60年代初狄龙回合谈判时就不断提及粮食自由贸易议题,并将其纳入到农产品自由贸易议题之中,在随后的肯尼迪回合和东京回合谈判中积极推动农产品贸易自由化。但60年代到70年代之间,农产品贸易自由化的谈判进程非常缓慢,成效也并不明显。80年代开始,国际农产品贸易环境恶化给了美国进一步推动多边农产品自由贸易机制以更大的动力[43]。

80年代启动的乌拉圭回合主要谈判方基本都认同追求更自由的农产品贸易,在这个基础共识之上,分歧主要是推动农产品贸易自由化的步调快慢、程度深浅[44]。由于发展阶段的不同,美国和欧共体在出口补贴上也存在不同态度,美国希望全部消除出口补贴,欧共体拒绝对出口补贴做出大幅度削减。1992年,美国和欧共体在华盛顿布莱尔宫展开双边谈判,谈判结果是美国在出口补贴、国内支持上后退一步,换取欧共体消除对国内粮食生产的支持①。1994年主要谈判各方便签署了《农业协定》。然而,乌拉圭回合虽然对农业保护政策进行了限制,但它的运行结果仍没能达到

① 资料来源:http://www.gmo-free-regions.org/fileadmin/files/ws_a3_paul_blairhouse.doc

美国的期望。为了深化农产品贸易自由化,美国便继续推动多哈谈判。但随着发展中国家力量的崛起,在多哈谈判中矛盾开始从美欧之间的市场准入问题演变成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特殊保障制度上的分歧①。以美国为代表的北方发达国家要追求降低市场准入,而南方的发展中国家则强调要维持粮食生产的保障制度。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农业谈判中的根本分歧是导致多哈回合最终走向破裂的主要原因。然而,美国推动粮食自由贸易的脚步并未就此停下。在多边自由贸易谈判停滞后,美国开始尝试通过区域性自由贸易协定来推动建立自由贸易的粮食市场体系。

现行的农产品贸易制度体系的核心主要还是沿用乌拉圭回合签订的《农业协定》(下称《协定》)。《协定》的主旨在于"建立一个公平的、以市场为导向的农产品贸易体制……提供实质性逐步削减农业支持和保护政策,以纠正和防止限制与扭曲的农产品贸易规则。"②但不管是从《协定》的规则设置以及实施结果上来看,《协定》的真正作用是推动有利于美国的粮食贸易自由化。虽然《协定》的规则体系存在着许多漏洞,但其本质还是服务于美国私营资本追求垄断全球市场供应的目的。

美国自战后设立的全球粮食市场体系一直以来都服务于美国私营资本的利益。40 年代到 70 年代的全球粮食援助制度,不仅解决了由美国国家干预导致的国内生产剩余问题,还通过将大量剩余向海外市场的倾销抑制了其他国家的粮食生产,打开了其他国家封闭的市场。因而在这一时期,全球粮食价格维持着一种低价趋势。而 70 年代开始,由于国际国内环境的变化,美国开始倾向于建立一个有助于粮食全球自由流动的自由贸易市场体系,但这一时期由于农业技术革命和欧洲粮食产量的激增,全球粮食市场虽然转向自由贸易,但却因为供给充裕而保持着低价态势。但通过构建一个自由贸易的粮食市场体系,美国谋求扫清国际市场上的贸易与投资壁垒,为私营资本控制全球粮食市场、提取高额垄断利润的来服务。当粮食自由贸易市场体系在 90 年代初见雏形之后,全球粮食价格便也呈现出逐步攀升的趋势。

四、总　结

上文的分析表明,目前全球粮食市场体系中的主导权力是美国的私营资本。从国家干预的全球粮食市场体系到自由贸易的全球粮食市场体系,私营资本所追求的都是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优势并谋求对全球市场的控制。在国家干预的全球粮食市场体系下,私营资本借助美国的国家权力优势打开封闭的海外市场、增强自身的竞争力。而当私营资本借助早期国家权力的庇护,获得了全面的竞争优势并迅速崛起之后,便进而又借助美国的霸权地位谋求在全球建立一个自由贸易的粮食市场体制,以期能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竞争优势,进而寻求对全球市场的全面控制。

进入 21 世纪,这个由私营资本推动、美国主导的自由贸易全球粮食市场体系已经日趋成型,这个市场服务于私营资本谋求全面垄断世界市场的利益诉求。

近期的全球粮食市场已经呈现出被私营资本全面垄断的态势。在自由贸易全球粮食市场体系下,私营资本不仅逐步强化了对全球生产的垄断控制,还进一步追求对市场供应的全面控制。

在自由化的推动下,通过投资和借贷等手段,私营资本强化了对全球生产的垄断控制。当前,全球范围内的农业生产呈现出产业化、集聚化的发展趋势,这使得农业生产开始逐步摆脱生态条件的限制,并愈加依靠外部的资本支持。农业生产对资本的高度依赖,不仅改造了生产经营模式

---

① 资料来源:http://www.wto.org/english/thewto_e/minist_e/min01_e/mindecl_e.htm

② 资料来源:http://www.wto.org/english/docs_e/legal_e/14-ag_01_e.htm

将小农生产推向边缘,还加速了农业生产的垄断集中,全球范围内的农业生产开始在跨越国界私营资本的控制下走向集中。除了推动全球生产走向产业化集中之外,私营资本还深化全球粮食市场的结构不平等,通过前期将廉价粮食倾销至国际市场抑制了发展中国家的粮食生产,私营资本在全球构造出一种南方依赖北方粮食生产的局面,进而借助这种非对称的结构来谋求垄断利润。

除了控制生产之外,私营资本还逐步实现了对市场流通的垄断控制。虽然全球粮食国际流通的份额只占据全球粮食生产总量的15%,但实际上这部分全球流通呈现出被私营资本垄断的台式,并已经开始影响到局部和区域市场中的粮食价格[45]。这种对市场流通的控制,塑造了一个一体化的市场环境,降低了区域粮食市场抵御风险的能力,破坏了区域农业市场的调节机制,使得整体市场都受到私营资本的影响。除此之外,近年来的私营企业巨头还通过对全球粮食供应链整合,开始谋求对全球市场消费需求的垄断控制。

自由贸易全球粮食市场体系逐步成形,这意味着私营资本开始全面渗透进粮食市场。通过设立各种有利于私营资本全球扩张、实现垄断的规则制度,全球粮食市场已经逐步控制在私营资本手中。可见,目前的自由贸易全球粮食市场是一个私营资本控制下的市场,是一个为私营资本谋求垄断利润的市场。对于这时的私营资本而言,粮食供给的相对稀缺以及粮食价格的剧烈波动便意味着巨大的利润以及获取巨大利润的机会,高价与动荡正符合私营资本谋求高额垄断利润的利益需求。

如此看来,当前的全球粮食价格波动最根本的原因是在自由贸易全球粮食市场体系下,私营资本全球扩张、控制市场的能力得到了释放,并开始通过自由贸易市场体系提取垄断利润。天气引起的歉收、石油价格引发的生产成本上扬、资本投资以及生物燃料对全球粮食库存的过量消耗都只是加剧了私营资本借助全球粮食市场来提取高额垄断利润的程度。对垄断利润的追求主导着新千年之后全球粮食市场的走向,这也意味着一旦私营资本借助自由贸易的市场机制固化了自身对全球粮食市场垄断,全球粮食市场势必会成为资本追逐利润的场所。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只要未来全球粮食市场继续服务于私营资本攫取高额利润的需求,那么全球粮食市场价格将会继续维持目前这种高位震荡的局面。

参考文献:

[1] FERREIRA FHG, FRUTTERO A, LEITE P G, et al. Rising Food Prices and Household Welfare: Evidence from Brazil in 2008[J].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2013, 64(1): 151 - 176.

[2] ABBOTT P, DE BATTISTI A B. Recent Global Food Price Shocks: Causes, Consequences and Lessons for Africa Governments and Donors[J]. Journal of African Economies, 2011, 20(1): 12 - 62.

[3] [英]亚当·斯密. 国富论[M].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

[4] [英]大卫·李嘉图. 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M].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

[5] [英]马尔萨斯. 人口原理[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168.

[6] [美]威廉·阿瑟·刘易斯. 经济增长理论[M]. 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9.

[7] [印度]阿马蒂亚·森. 贫困与饥荒:论权利与剥夺[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13.

[8] CHIEW FHS, TENG J, VAZE J, et al. Estimating Climate Change Impact on Runoff Across South-east Australia: Method, Results and Implications of Modeling Method[J]. Water Resources Research, 2009, 45(10): 1 - 17.

[9] ROSEGRANT M W, ZHU T, MSANGI S, et al. Global Scenarios for Biofuels: Impacts and Implications[J]. Review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2008, (30): 495 - 505.

[10] BARNARD J R. Gasohol/ethanol: a Review of National and Regional Policy and Feasibility Issues[J]. Regional Science Perspectives, 1983, 13(2): 3 - 14.

[11] COOKE B,ROBLES M. Recent Food Prices Movements: A Time Series Analysis[R]. IFPRI Discussion Paper No. 00942,2009.
[12] COLLINS K J. The Role of Biofuels and Other Factors in Increasing Farm and Food Prices: A Review of Recent Developments with a Focus on Feed Grain Markets and Market Prospects[R]. Kraft Food Global. Inc,2008,19.
[13] World Economic Outlook Update[R].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2009.
[14] ABBOTT P C, HURT C, TYNER W E. What's Driving Food Prices in 2011? [R]. Farm Foundation Isuue Report, 2011.
[15] [英]卡尔·波兰尼. 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M].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4.
[16] HEADEY D. Rethinking the Global Food Crisis: The Role of Trade Shocks[J]. Food Policy,2011,36(2):136 - 146.
[17] Abbott. PC Modeling International Grain Trade with Government Controlled Markets[J]. 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1979,61(3):22 - 31.
[18] MARTIN W,ANDERSON K. Export Restrictions and Price Insulation during Commodity Price Booms[J]. 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2012,94(2):422 - 427.
[19] 顾　良. 布罗代尔与年鉴派[J]. 史学理论研究,1994,1(61):107 - 116. 112
[20] FRIEDMANN H.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Food: a Global Crisis[J]. New Left Review,1993,(1): 29 - 57.
[21] MCMICHAEL P. A Food Regime Genealogy[J]. The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2009,36(1):139 - 169.
[22] [美]罗伯特·基欧汉. 新现实主义及其批评[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204.
[23] GIOVANNI FEDERICO. When did European Markets Integrate? [J]. European Review of Economic History,2011, 15(1): 93 - 126.
[24] DEREK HEADEY,SHENGGEN FAN. Anatomy of a Crisis: the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Surging Food Prices [J]. Agricultural Economics,2008,39(s1):375 - 391.
[25] [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 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105,108.
[26] FEDERICO G. When did European Markets Integrate? [J]. European Review of Economic History, 2011,15(1): 93 - 126.
[27] [英]克拉潘,现代英国经济史·上卷[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329.
[28] [法]保尔·芒图. 十八世纪产业革命[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387.
[29] SHELDON R. Practical Economics in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 Charles Smith on the Grain Trade and the Corn Laws,1756 - 72[J]. Historical Research,2008,81(214):636 - 662.
[30] THOMAS J A. The Repeal of the Corn Laws,1846[J]. Economica,1929,25(9):53 - 60.
[31] [英]克拉潘著. 现代英国经济史·下卷[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22,23.
[32] WINDERS B. The Vanishing Free Market: The Formation and Spread of the British and US Food Regime[J]. Journal of Agrarian Change,2009, 9(3):315 - 344.
[33] TRACY M. Government and Agriculture in Western Europe, 1880 - 1988[M]. London: Harvester Wheatsheaf, 1989: 21.
[34] HARLEY C K. Transportation, the World Wheat Trade, and the Kuznets Cycle,1850 - 1913[J]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1980,17(3):218 - 250.
[35] GOODWIN B K,GRENNES T J. Tsarist Russia and the World Wheat Market[J].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1998,35(4):405 - 430.
[36] [美]查尔斯·P·金德尔伯格. 世界经济霸权:1500 - 1990[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218.
[37] HYNES W, JACKES DSAND O'ROURKE K H. Commodity Market Disintegration in the Interwar Period[J]. European Review of Economic History,2012,16:119 - 143.
[38] HEADEY D,FAN S. Anatomy of a Crisis: the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Surging Food Prices[J]International Food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2008,39(S1):375 - 391.

[39] 斯坦利·L·恩格尔曼,罗伯特·E·高尔曼. 剑桥美国经济史·第一卷[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131.
[40] HEADEY D,FAN S. Anatomy of a Crisis: the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Surging Food Prices[J] International Food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2008,39(S1):375 - 391.
[41] [美]杰拉尔德·冈德森. 美国经济史新编[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495.
[42] 斯坦利·L·恩格尔曼,罗伯特·E·高尔曼. 剑桥美国经济史·第三卷[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219.
[43] Draft Ministerial Declaration, 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R]. Preparatory Committee, 1986.
[44] Negotiating Group on Agriculture 26 - 27 October 1987[R]. Statement by European Communities, Group of Negotiations on Goods, Negotiating Group on Agriculture, 5 November,1987.
[45] VAN DER PLOEG J D. The Food Crisis, Industrialized Farming and the Imperial Regime[J]. Journal of Agrarian Change,2010,10(1):98 - 106.

The Structural Cause of the Recent International Food Prices Rising

SU Rui-na
(*School of Government*,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46, *China*)

Abstract: Global food price has been affected by supply-demand relationship in the market, but the power which shapes the market structure confines the influence of supply-demand and dominates the long trends of the global food price. If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purpose of the dominated power in the market have been figured out, the basic trend of global food price can be predicted. The most competitive body can change the structure of the inner country market and promote this structure to the world market though national power and run for their interests. Now the private capital class of America controls the world food market and runs for the monopoly profits in world food market, thus the price of global food market demonstrates a high and turmoil situation.

Key Words: food prices; food regime; market supply and demand; private capital

---

关于开通二维码扫码阅读功能的公告

【本刊讯】为进一步拓宽读者的阅读渠道,本刊定于2014年第3期开通单篇文章的二维码扫码阅读功能,通过扫描每篇文章的二维码标识,读者可以使用手机、平板电脑等移动终端快速阅读、下载文章的电子版。扫描每篇文章首页右上方的二维码,点击"下载"即可在线打开文章pdf文件并进行保存。这是继2014年第1期在期刊扉页印制学报主页的二维码标识开通二维码浏览功能以来,本刊进一步利用二维码技术,集合了纸质媒体与数字媒体之长,让期刊不再受版面与发行数量限制,为读者带来更为便利的阅读体验。

此外,本刊已开通微信公众平台(微信号:skxbscau)、腾讯微博"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科版"(域名:http://t.qq.com/hnna2002? preview)和新浪微博"华南农业大学学报_社会科学版"(域名:http://weibo.com/hnna2002),读者关注以上公众平台可以接收到本刊更多动态信息。本刊将致力于以更多不同的方式为读者、作者提供更好、更便捷的服务与体验。

本刊编辑部